



新时代女性写作应有的意识

□李 云

握和表达缺乏一个支点,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书写生活,而缺乏历史总体性的眼光和对当下深层次的审视以及对未来变革的预测。从1990年代起,女性写作步入了“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向内转”现象,一些女性作家囿于“小我”情感领域,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游走,对现实缺乏热情,笔下“多余”泛滥,“时代新人”缺席,同质化、小资化、书斋化写作盛行,作家对时代的担当处于模糊、退缩和失守状态。因而,面向新时代,我们的女性作家要“向外转”,把“我”放进社会现实中,去描写新时代的“新史诗”、“新气象”、“新人物”、“新精神”;要从“自我囚徒”中解放出来,拓宽对现实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洞见生活本真的真实,有意识地唤醒和不断接近、把握整体性经验,使作品更具精神力量。只有这样,我们的写作才能以对现实的关注,重新返回当代社会的公共言说空间,使作品触觉敏锐、质感丰盈,呈现出更为广阔意义的表达。这是一种文学使命和责任担当,它决定着作家的胸襟和文学格局。

生活与深度 里尔克告诉我们:作家要有足够的伸缩力、容纳力和间离力,要与世界建立丰富、深刻的联系,要对时代发展本有自己看法,要站在更高的审美的角度去书写生活。文学作品要动人,就要真实而有深度,这些都来源于深切的生活。面向新时代,我们的女性作家要守望生活“现场”,进行“有根基的写作”;要深入生活,到人民群众中去汲取创作资源和营养,真正写出人民心中所

想、人民心中所念的作品。我们要深扎大地,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吃透,从而创作出厚重有力的文学作品,而不是远离时代、远离现实、远离生活,表达矫情和作伪的“个人经验”。我们要走出“小我”的内里营造,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与社会变迁,用个体经验映照生活的脉络及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要在现实主义的格局之下,在更加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把自己最深沉、最细腻、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经验和时代感知呈现出来,这样才能写出急速发展中的中国时代面貌,写出具有鲜活生活质感的作品,写出一代代人命运轨迹与精神变迁的作品,写出真正的中国故事来。

女性独特写作与作品的温度 女性独特写作意识是对当代女性作家艺术表述上的要求,它要求女性作家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温情、悲悯等特点,进行个性表达,形成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当下的女性文学能自觉地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书写女性经验、女性认识和女性体验,往往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当代人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冲突上,有着对现代情感的反思,但也有身体意识、个人呓语等缺陷。面向新时代,我们的女性作家要在开拓创作视域的同时,形成自己的丰富而善思的独特文学品质。作家可以以温情和悲悯的情怀思考人生、捡拾历史,用细腻敏锐的笔调于看似琐碎中发现温暖和明亮,写出大时代转型期中国人的情感;可以从最初的婚姻情感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远大的世道人心,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书写世

风世相、家国春秋,从女性、婚姻、家庭与情感之中跳脱出来,以女性心理、情感和命运的状写,表现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与忧患,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可以以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体认,对中国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新探索,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情感……如此当代女性写作的创作风貌才会百花齐放。

精品与气度 文学写作是一种将自己的生命、生活方式与文学联系起来的精神性追求。作家要从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才能写出具有精神特质的精品力作。因而,面向新时代,我们的女性作家写作时,要反对一般性写作,提倡有难度的写作,要反对习惯性写作,提倡创新性写作。我们要把笔触伸展到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巨变的脉搏上,进行“有难度的写作”,让文学所秉承的真诚而崇高的作家立场和高贵而纯正的文学品格回归灌注到作品中去;要从审视历史的思想与哲学的高度,通过对生活“现场”的不懈守望和对现实的正面强攻,不仅从时代深处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资源和精神家园,还要找到当下时代恰当的文学形式,重塑新叙事形态;要增强写作耐力和创新能力,以脱离自我重复和惯性写作的勇气,实现一种对文学表达可能性的探索,写出他人不能复制和自己不再复制的作品来。

面向新时代,女性作家要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坐标系中重新定位,获得文学的力量。

本期话题:

女性作家 表达



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的感慨。

身处快速旋转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这些对文学的热爱者能够经历繁杂,越过艰难,向着指引自己精神世界的那缕光明艰难却坚定地跋涉,痛苦却安然地前行,是因为我们在低头耕耘的时候获得了内心的光明。妇女节来临之际,琢磨“女性”与“作家”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倒颇有一番感想涌上心头。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更需要作家发现关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勇于担当,以新的视角创作新的作品,回应现实,温暖人心,引人向善。

文学的重量来自生活。新时代,女作家应该深入日常生活打捞创作素材。有的女作家慨叹自己生活之平淡,笔下生活也无法逃出琐碎日常的命运。“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恒久的命题,“作家如何通过日常生活进入深度写作”是值得每一位作家思考的命题。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经历惊涛骇浪的传奇生活,但他们善于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和触角捕捉生活的细节、感知生活的气息,继而把它们转化成文学创作的素材。例如迟子建的笔下都是平常日子的酸甜苦辣,但她却在平淡生活的根基上建筑起了自己的文学大厦。她的作品表现的都是平凡的人生和循规蹈矩的生活,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但却表达了生活中的美和温暖,真抵生活本质,接近文学真理。

铁凝说:“只有奋力挤进生活的深部,你才有资格窥见那些丰饶的景象,那些灵魂密室,那些斑斓而多变的节奏,文学本身才可能首先获得生机……”现实生活五彩斑斓,女作家应该培养自己驾驭生活的能力和表现现实生活的功力,对社会、生活和人生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用手中之笔反映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人性温暖。日常背后是复杂的人性,庸常的生活中往往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我并不赞赏女性作家有意识地把自己标签化。新时代赋予中国女性发挥才华能力更好的环境,女性作家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女性作家更应该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但相当多的女性潜意识里还“裹着小脚”,没有迈出束缚其精神的“四合院”。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体悟在男权话语体系中的女性的艰难。但新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女性作家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更不应该在精神内核上滞后于社会发展。希望更多的女作家能够在精神上生活中同样在文学创作中去掉“裹脚布”,走出“四合院”,少些咿咿呀呀,少些浅吟低唱,真正进入、参与、体悟火热的社会生活,增强自身阅历的厚重,写出社会、时代、读者喜欢的好作品。

无论是女性作家还是男性作家,在文本创作上,固然能够通过性别体现作家的创作风格,但在作品主题上,这不是一个局限,一些优秀的女作家同样可以超越性别去描写宏阔的社会生活。相反,我认为女性作家更应该发挥自身的性别优势,比如细腻的笔触、母性的情怀等等,为自己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去深入生活,体察生活,书写生活,写出有重量的文学作品。如梁鸿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于是有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一系列作品。当今中国文坛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作家叶广芩,非常反感媒体对“格格作家”的渲染,直言自己是一个最平民化的作家,创作了大量家庭题材的小说,如《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黄连厚朴》等。

新时代作家要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文艺作品具有滋养心灵、净化心灵、引领灵魂去向的功能,无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写出的作品都应该能够滋养读者心灵,引领读者认清生活本质、超越生活苦难、走向更高的精神层面。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文学应该具备引人向善的力量”。好的文学作品是照亮人类灵魂的灯塔,既然热爱文学并踏上文学创作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就应该于追寻中坚持初心和梦想,于写作中抒写理想和情怀,于文学中彰显道义和担当。新时代,初心尤可贵。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心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意识,在平凡日常生活亦或宏阔社会生活中打捞文学创作的“珍珠”,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

藉着光明前行

□陈艳敏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女性作家还是一个男性作家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也是写得好坏之分,境界高低、胸怀大小之分,喜欢和不喜欢之分。作家不分男女。好的作家更无男女之别,尤其是写到了至深处或最顶点。在那个至高的点上,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目光、笔触乃至胸怀境界是一致的,那时候他们不但超越了男女性别,还超越了性别之外的很多东西,甚至超越了生命和自我。我喜欢贾平凹先生的一句话:云层上面都是光。

“女性”和“作家”之间要加一个空格,而这个话题的提出,也是基于近些年来文学作品中负面女性形象过多的背景,除了这些负面的东西,生活中是否还有更多积极、健康的内容可以关注?作家如何将目光从婚外情、三角恋等狭隘的负面空间移向女性的精神成长?现代女性究竟应该呈现怎样的风貌?女性作家应该如何呈现女性观?平凡的生活能否成就伟大的作家?

我认为,生活与文本是高度吻合的。作为一个散文的写作者,我仍然认为真挚与虔诚是散文写作的灵魂和密码,是为人文的重要原则和基点,因此,我欣赏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人与文高度统一的写作。这个统一并非生活的照搬照抄或人与文的相互复制,而是人与文精神境界的统一,知行合一的统一,生命和文本相融相合的统一。生命的走向就是文本的走向,生命到了哪里,文本便被带到哪里,是生命

品都将注定是昙花一现或过眼烟云。至于平凡能否成就伟大,我想说,伟大从来就是在平凡中成就的,在平凡中见出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和不平凡。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缺少了对于平凡生活、平凡人事的关心与关注,观照与观察,如果缺少了悲悯的情怀和情感,缺少了一颗贴近平凡的素朴之心,偶然的成就也终不会将他带得更远。

生活是作家创作不可脱离的背景和源泉,无论哪一种生活,都可造就伟大的作家,“伟大”不在于生活,而在于作家。当然,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成就不是目的,伟大不是目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超越成就的价值追求,只将目光和心思专注于“成就”二字上,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伟大作家。所以让我们抛开杂念,专注于我们内心的不懈求索。



女性作为写作者的三种困难

□袁 瑛

者拿起笔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反抗意味着开辟新道路,这将是一段黑暗中横冲直撞的莽撞路程。

第二种困难,是女性角色兼顾的困难。这种兼顾的困难,具体表现出来便是女性写作者很难有圆满的日常生活。她们大都成为世俗生活的“出轨者”,单身、独身、丁克者多。亦就是大家常谈到的女性写作者的“非正常生活状态”。写作毕竟是件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在写作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在其他角色里能分配的时间必然就会少下来。而女性写作者在角色兼顾的过程中造成的某种角色的放弃、忽略、淡化,都是在这种兼顾的冲突中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而能循着人生的时间序列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是女性写作者的圆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复制性。但是,女性写作者该如何面对这种写作史事实?遵从?反抗?遵从意味着女性意识的消失,这与女性写作

女性如果要正常的恋爱、结婚、生育,她和她的丈夫同时处于这三件事情中,女性也会因为性别原因的关系,天然就付出比男性更多的时间。一个中国女性要结婚、生育,必然要面临对职业发展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放弃。中国女性在婚姻、工作中的困境,是大于男性的。而一个要消耗女性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写作者”身份,更给本身就处于婚姻、工作夹击中的女性以新的困难。

第三种困难来自于女性本身,是女性意识自我觉醒的困难。这个困难,其实与前两种困难密切相关。第一种困难为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造成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层面的阻碍,第二种困难为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造成了生理和心理的阻碍。也就是女性意识的自觉其实是处于一种全然阻隔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境况下,女性意识的自觉其实只能期待女性群体冒出“波伏娃”。女性意识的自觉是女性是否自我精神内核的问题,这个“内核”的裂变、辐射,决定女性

写作的广度和深度。

男权社会对女性写作的回应是稀少的,而对这种“认可”回应的沉寂,恰好表明大部分女性写作者对自我、文学、社会的判断,仍然遵循着男权社会的标准和尺度。这种“遵循”,表明即使是作为写作者的女性,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建立亦是茫然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度仍然处于一个低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一批女作家在写作主题上沉湎于身体写作,固执而频繁地呈现对女性身体表现的偏执,这其实是女性写作者女性意识的苏醒和觉悟最原始的呈现。这亦是一条最迅速的表达女性意识、发出女性声音的捷径——充分利用男女两性身体生理的差异,而直接说出这种差异,公开化这种差异,从而引起男权主流社会对女性意识的侧目。以身体意识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尺以陈染和林白等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转型而黯然落幕。新时期女性写作者如何在一种先锋性的探索碰撞之后寻找到女性意识的精神范畴,以及呈现女性意识的载体和方式,是一个路漫漫的过程。

女性写作者是全部女性中的孤独者、觉醒者。她们是暗夜里使劲生长的树,向广袤而遥远的天空寻求辽阔,寻求深邃,寻求真正自由的飞翔。



今天的许多女性写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亦即写作没有与我们的工作重叠,“写作者”身份是我们在女儿、妻子、母亲、工作者之外额外添加的一种身份。首先这种“额外添加的身份”,就会对以上各种既定的社会身份在时间上进行挤压;而添加的恰又是“写作者”身份,这种身份具有渗透性、侵略性,它不仅改变一个女性对自己生命时间的分配和使用,而且改变一个女性生命时间的质量和密度。但是这种“额外添加的身份”和女性身份结合起来,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不少困难,甚至是困境。

第一种困难,是女性写作史短的困难。这与女性教育史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接受文化普及教育史非常短。中国女子无学,自古“女子无才便是德”。清代以前的女子如果侥幸能识文断字的,多赖于家庭教育。即她恰好生活在一个可以为她提供文化教育的家庭里,父兄可以作为她的老师;或者家庭经济允许,家长开明,可以为她延请私塾先生开课授学。如果把1904年吕碧城创设中国第一间官立的女子学堂北洋女子公学作为中国女性文化普及教育史的开端的话,至今也就114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与男性数千年掌握文化知识权的时间相比,真是不堪一击。由此而产生的困难是,女性写作面临的文化支